

关系排斥：家长参与和农村居民
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平等
——一项基于转型县的人种志考察
**Guanxi Exclusion in Rural China: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Students' College Access**

谢爱磊 (Xie Ailei)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白杰瑞 (Gerard A. Postiglione)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内容提要：自2008年12月起至2009年12月间作者在中部省份某县进行了实质性的田野工作。通过文献法，访谈法，田野日志的综合应用，作者对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家长对参与子女教育的看法与相关策略进行了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为何在大陆农村社会内部，市场化改革强化了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家庭子女的大学入学优势，而来自农村社会的一般农业劳动者，其大学入学弱势仍然明显。

关键词：市场转型 高等教育机会 关系排斥

Abstract: Market reforms have re-stratified rural China, maintaining advantages for cadre households and creating space for an emergent economic elite, both with better college access than peasant households. Mos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re predictors of rural students' college access. This study, based on intensive fieldwork in two townships and three villages of a county in central China, argues that there is an increasing tendency of rural parents to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at this involvement has also become a determining factor in college access for all rural groups. Moreover, parental involvement includes a process of capital conversion, similar to that described by Bourdieu, but is mediated by how households capitalize on rural transition from a planned to a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llege access; guanxi exclusion

导 言

20 世纪末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开始有机会进入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学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有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社会资源与地位分配机制的重大变化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分层现象,并初步探讨了这种现象给农村居民的高等教育机会所带来的影响。他们发现,市场化改革虽然促进了高等教育机会的总体扩张,但是,新增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并不公平。从研究结果来看,它强化了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家庭子女的大学入学优势。而来自农村社会的一般农业劳动者,其大学入学弱势仍然明显。在厦门大学 2004 年针对中国大陆 34 所高校的调查

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来自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子女，其大学入学机会要远远高过来自一般农业劳动者家庭的子女。

由中国社科院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将中国社会划分为10个阶层。在农村社会内部，一般农业劳动者比例有70%，另外30%由干部、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9个阶层组成，其中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这类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崛起的新型的经济精英，其比例不过9%。但是，这两类精英的子女在大学入学机会上均要明显好过来自一般农业劳动者家庭的子女。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一个迫切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新的机会分配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到底是什么？为何在农村社会内部，干部与技术人员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能够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上的优势？

文献及解释：国家、市场与教育机会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及其解释是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在西方的教育社会学文献以及深受其对教育不平等问题解释路数影响的中文文献中，家庭及其在“市场”中的地位被看作是个人地位竞争的主要起点，家庭中各类资源的多寡被看作是理解个人教育机会的主要解释性因素。大陆独特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也使不少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国家的再分配机器及其对普通人教育机会与生命历程的深刻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社会实验及其后来的发展提供了理解国家机器对个人教育机会与生命历程可以如何施加影响的绝佳素材。相关的制度安排以及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对个人的教育机会以及生命历程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Hannum, 1999: 193-211; X. Zhou, 2004）。国家的资源再分配制度是影响普通人教育机会的第一重因素。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中，泽林尼（Szelenyi, 1978: 63-

87) 和周雪光 (X. Zhou, 2004) 曾提出,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分配原则遵从一定的政治考量, 国家机器总体的政治考虑与目标塑造了资源分配的基本逻辑。从国家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看, 东部发展先于西部; 工业城市以及政治中心的发展先于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农村。在教育资源分配的基本格局中, 东部城市以及政治中心一直被置于优先的境地。在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格局中, 我们清晰可见一个从东部到西部或从城市中心出发, 依行政权力而衰减的等级框架 (杨东平, 2006)。这样的资源分配格局对普通人的教育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 来自城市户籍的学生, 其进入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机会均要好过来自农村户籍的学生。杨东平等人的研究甚至表明, 城市住民而非农村居民是高教扩张的主要受益者 (杨东平, 2006)。

不过,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来, 中国大陆开启并施行了向市场制度转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这些措施及其影响对上述解释范式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挑战。首先, 上述解释范式过于看重中央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绝对影响力, 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来的中央向地方的适度分权, 实际上弱化了中央对地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力。在改革前就已经获得优势的东部与城市地区可以借力已经累积的资源优势在新的市场竞争中将西部与农村地区抛在身后。这也是为什么尽管中央一直强调并着力统筹与均衡东、西部, 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 但东部与城市地区的教育资源优势、居民的教育机会优势仍然存在的原因 (W. Li, Park, & Wang, 2007: 27-43)。其次,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随着市场化改革更为显性地存在的社会分层现象也提醒我们注意, 家庭及个人的相关竞争策略也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解释性因素。舍此, 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何在某一单一区域的农村社会内部, 在类似的教育资源约束状况下, 农村社会的某些人群, 例如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 其子女的教育机会要高过一般农业劳动者。

韦伯认为, 西方社会的市场制度, 将个人之间的地位竞争转化为以各种资源为基础的竞争, 个人在地位竞争中的结果越来越取决于其家庭在市场中的地位 (Runciman & Matthews, 1978)。个人赖以竞

争、家庭用以投资的各类资本可以有形的经济资本，也可以是无形的文化资本（Ball, 2003; Bourdieu, 1986: 241-258; Collins, 1971: 1002-1019）。针对大陆的研究表明，家庭经济资本的确是高等教育机会的重要解释性变量。例如，王伟宜等人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多地就读于层次较低的公办高校，家庭收入较高的子女，在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中也享有一定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高教成本分担的语境中愈发明显。文化资本指代个体所掌握的各种有关规范、风俗、传统以及品位的知识（Bourdieu, 1986: 241-258）。学校系统所传递和沉浸其中的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所珍视的文化，来自优势群体家庭的子女，由于从小置身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更能适应学校的学习与风格，其获得成功的概率要远远高过来自地位低下的其他群体家庭的子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以被看作是家庭文化资本存量的重要指标，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其子女的高等教育机会要高过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父母为大学毕业生的学生，其进入重点大学学习的机会要高过其他家庭。（王伟宜，2006）

上述理论从地位竞争的角度提出了教育机会的可能性解释，它们让我们意识到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源对个人教育获得的重要影响。不过，这种解释也有其问题所在。资本的提法本身蕴含了“资源”与“投资”的双重含义。而相关研究太过强调资源贮量的结构性约束，对家庭投资的过程方面所进行的讨论则付之阙如。这使得它们关于资本的抽象论述缺乏一定的历史感，忽视了作为投资者的家庭所置身于其中的制度与文化背景。同一类资本和不同的资本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会有不同的价值，它取决于一定场域的特性和游戏规则（Bourdieu, 1986: 241-258）。以经济资本的投资为例，当学校选拔的标准注重学生的学业成就时，家庭的经济优势就可以通过如购买舒适的住房、提供好的营养条件等方式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智力刺激环境转化为子女的学业优势；也可以通过诸如购买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私人咨询与辅导服务，从而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等方式转化为子

女的学业优势 (Massey, 2003)。而当学校的选拔不甚公正, 滋生腐败时, 家庭的经济优势则可以通过贿赂、走后门等方式直接转化为子女的入学机会 (文东茅, 2006)。具体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及规则决定了何种资本具有教育投资的价值, 或者具有多少价值, 也影响到了不同的家庭到底要怎样将自己的文化和经济资本优势转化为孩子的学业成就优势, 而也正是这点赋予了家庭投资的“策略”含义。“投资”与“策略”双重隐喻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家长参与这一家庭资源运作的过程维度。

理论框架：家长参与、资本转化与社会资本的不平等

当前对农村社会内部高等教育机会分层现象的两种解释路径依然让我们无法对普通家庭如何运作家庭的资源从而帮助子女获得大学入学方面的优势有更为清晰的认识。以再分配制度为基础的解释, 尽管有助于我们认识宏观制度对个人教育机遇的影响, 但却对家庭、对自身已有资源进行动员的能力关注不足。以地位竞争为基础的解释, 尽管有助于我们考察不同家庭动员各类资本为子女争取教育机会的能力, 但却很少关注不同家庭动员各类资本的过程以及这些微观层面的社会行动过程与宏观的文化背景和制度有着怎样的关联。因此, 在解释传统的再分配制度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如何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上的优势以及一般农业劳动者所面临的劣势时, 我们需要一项新的议程: 在转型时期相关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 在制度与个人的互动中对家庭资源的过程维度——家长参与——进行研究, 并以此来考察普通人的教育机会与生活际遇。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来, 家长参与教育的过程包含家长所参与的与孩子的学习相关的所有活动与努力 (Desforges & Abouchaar, 2003)。不过, 在以西方为背景的研究文献中, 它主要包含: (1) 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 例如监督、管理孩子的课后时间, 辅导孩子的学业等; (2) 以学校为单位的活动, 例如参与家长会活动等; (3) 社

区中的活动，例如保持与其他家长的联系，联合对孩子实施监督等活动（表1）。研究者认为，家长的参与活动提供了将家庭的经济与文化资源转变为对子女而言有教育意义的资源的重要途径。

表1 家长参与的分类与含义

类 型	含 义
抚育	提供住宿，保障健康，保证营养与安全，具备与孩子沟通的技巧
沟通	家校沟通
自愿活动	在学校中或班级中帮助开展有关活动
家庭辅导	帮助家庭作业，帮助进行相关教育选择
决策	参与家长会或学校管理活动
社区活动	捐资助学

改编自 Kreider, H. 2000. *The nation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schools: a model for family-school-community partnerships*. Cambridge: Harvard Family Research Project.

在本研究中，根据社会资本与教育间关系的研究，将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抽象化为一个资本转化的过程，视其为家长动员家庭内部、家校之间或者社区之中的网络将自身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向对子女的教育而言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资本的转化过程（Coleman, 1988; Lareau, 1987: 73-85; M. Zhou & Kim, 2006: 1-29），并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寓意社会行动者从其个人的关系连接中所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它内在地包含了三个基本的要素：一为网络连接；二为带有目的和一定行动选择的行动者；三为潜在收益（Bourdieu, 1986: 241-258; Coleman, 1988: 95-120; Lin, 2002; Portes, 1998: 1-24）。在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献中，家长可以动员与投资的关系网络，既可以包含家庭内部的网络连接，也可以包含家庭与学校的连接，甚至还包含在社区中保持与其他家长的连接（Shavit & Pierce, 1991: 321-330）。这些网络连接是社会资本投资的基本结构（Bourdieu, 1986: 241-

258; Burt, 1992; Coleman, 1988: 95 - 120)。它们在性质上有“强”、“弱”之分,不同的关系网络所传递的资源类型会有所差异(Granovetter, 1973: 1360-1380)。例如,家庭和社区中的强关系网络,可能意味着父母对孩子学习事务的更多关注(如辅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控制孩子看电视)与社区中良好的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规范的形成(Coleman, 1988: 95-120),而与学校的弱关系连接则有可能意味着家长与教师之间可能的信息流转。所有这些也意味着对不同类型关系网络的运作与投资可能会带来不同的社会资本收益。

不同社会阶层获得社会资本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一方面,资本的转换意味着社会资本的获得需要以行动者已有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储备为前提(Bourdieu, 1986: 241-258);另一方面,资本的转换也意味着社会资本的获得依赖行动者对关系网络进行动员进而顺利实现经济资本或/和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特别强调普通家长对社会网络的动员及其通过这种动员实现的家庭文化和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但是并无意否定社会资本的独立性和本源性——社会资本并非完全派生于经济和文化资本。所强调的是,作为独立的社会行动者,家长需要依据社会场域的特性,来判断何种资本最有价值,并依据这种判断来将自身的优势资本转化为此一场域内最有价值的资本,而社会关系网络提供给家长们将文化和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可能性。

资本的储备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约束性,其含义与林南提出的地位强度命题基本一致:行动者的初始位置越好,其获得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的机会就越高(Lin, 2002)。而关系网络的运作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即便行动者的初始位置一般,其依然可以通过关系网络的运作,来获得将自身有限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的机遇。当然,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动员本身也体现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一般来说,社会行动者更有可能成功动员的是强关系网络而非弱关系网络,而强关系网络则意味着同质性而非异质性(Lin, 2000, 2002)。

对于本研究而言，这意味着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家长，其更有可能运作并成功动员的是家庭内部、社区内部、单位内部或者亲属关系等强关系网络。而对于弱关系，尤其是由地位不同的行动者（如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家长 and 身为中产的教师）连接所形成的弱关系网络，其动员存在一定的难度。

在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个体到底选择和动员何种关系网络，以及如何动员各种关系网络，还有赖于特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各种关系网络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本潜力以及不同行动者对其的认识（Bian, 1997: 366-385; Fei. X, Hamilton. G, & Wang. Z. 1992; Gold, Guthrie, & Wank, 2002）。对于中国社会中“关系”现象的研究表明，在工作找寻过程中，中国人倾向于使用私人性质的强关系网络——而针对西方社会工作找寻过程的研究却表明弱关系网络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Bian, 1997: 366-385; Granovetter, 1973: 1360-1380）。至于各种缘由，存在两种竞争性的解释：一种解释视“差序格局”为中国人际关系网络结构的基本特征，并视“亲疏远近”为国人动员社会关系网络时要考虑的基本要素。研究者认为，熟人、关系亲近的人往往是普通人最愿意求助的人。另一种解释视中国的市场转型与制度变迁为私人关系使用的解释性因素。例如，在工作找寻过程中，对私人关系的依赖，其原因可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而非其他；外国公司在工作投资的过程中过分依赖私人庇护关系，其诱因也可归结为法制结构的不完善（Hsing, 1996: 2241-2261; Smart & Smart, 1998: 103-129）。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上述两种论断都未免过于片面，对于私人关系网络动员的偏好可能是文化与制度综合作用的结果（Bian, 2002）。对于关系网络动员偏好的分析提请我们注意，在分析家长动员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中，需要区分两类性质的关系网络连接——一类为正式的，由各类法律以及各层面（国家与学校）的正式规定所定义的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网络连接；另一类则为非正式的，家长与学校之间所可能存在的私人关系网络连接。前者可能更多地由法律与正式的规定所界定，后者可能更多地由文化、不

成文的规则以及作为行动者的家长的行为所塑造。不同社会背景的家长到底会选择动员何种关系网络连接以及如何动员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既有赖于他们对这两种关系网络在资本转化中意义（亦即家长将家庭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转换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有赖于他们对于自身行动可能的策略与成功可能性的理性考量。而这两个过程，又都被制度和文化所塑造。

基于上述理论方面的考虑，进行了如下的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

家庭资源运作的过程维度，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家长参与的概念与资本转化的相关理论，转向普通家庭为争取子女的教育机会而做出的策略性选择，并以此来理解为何在农村社会内部，干部与技术人员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能够帮助自己的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上的优势。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社会资本的动员内在地包含了投资与策略这两个基本的内核。对这一过程的理解需要了解制度赋予了不同类型的网络连接何种资本潜力以及不同家庭对其的理解，也要理解一定文化背景下家庭对不同网络连接可动员性以及动员过程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采用的是人种志方法。采用这一研究路径有几个基本的原因。首先，本研究强调对于某一具体的社会过程的了解，它将家长参与概念化为一个父母动员关系网络将家庭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转换为对子女的教育而言有意义的社会资本的过程，还特别强调考察来自不同类型家庭背景的家长如何动员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对于过程性社会现象的认识与理解，人种志方法是一种较为适合的方法（Emerson, et al., 1995）。其次，研究者认为，在动员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中，家长需要对不同类型关系网络在资本转换中的价值有所认识，这种认识既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也是他们主观认知努力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特别强调获得对家长观点的诠释性理解、了解家长观点背后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人种志方法恰有助于我们获得此种理

解 (Hammersley, 2004)。最后,本研究还特别强调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这一行动本身的建构性特质,主张:家长对于自身“参与”行动的社会意义的主观建构(例如,不同类型行动成功与否)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参与”行为和其他相关社会行动。无疑,人种志方法所主张的诸种策略——例如与研究参与者的长时间接触、积极投身研究参与者的社会世界等——将有助于了解不同家长对其行动意义的社会性建构 (Emerson, et al., 1995; Fetterman, 2000)。

本研究的具体实地调研工作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以及2009年8月至12月间展开,持续时间为7个月。基于时间、经费以及方便同参与者进行深入交流方面的考虑。选择了中部某省所熟悉的转型县作为调研地点。转型县位于该省中部,面积超过1 800平方公里。2009年时,该县共有96余万人,其中88%为农村人口,散布在当地22个乡,256个村。正式的田野工作,从当地的一个宜姓(虚构的名称)村落开始,之所以选择从这一村落开始调研工作是因为笔者在这里居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熟悉不少当地人,有个初步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主要的田野工作又是以家长为主体的入户访谈,这样的人际关系网络应当有助于笔者调研工作的展开。后来为期7个月的田野工作也基本上是以宜村为中心,辐射周边两个地理距离并不遥远的村落(吴村与葛村)和一个乡,联系与各类家庭的也基本上是前期所建立或后来在此基础上所拓展的人际关系网络。在田野工作的后期,尽管再有机会使用不断拓展的关系网络扩大笔者入户访谈工作的范围,却没有这么做。其基本原因是,通过入户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已经饱和——亦即尽管受访家庭在不断增加,新的数据却不能够带来新的发现。这一点可以坚信,在宜村以及吴村与葛村所访谈的家长,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压力与可能拥有的行动选择自由应当与转型县其他村落的家长基本相似。在文本上,坚持田野工作是在一个县而非几个村落展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如此坚持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教育系统本身以及学生流动的跨边界性。曹诗弟 (Thogersen, 2002) 等人曾将中国近现代学校制度在农村的建立看作是一个国家

权力不断向乡土社会推进的过程。农村学校的地理布局与行政权力分配的逻辑基本一致——每个村（或几个村）有小学，几个村再共有一所或几所中学。这也意味着，一旦进入中学，学生需要离开自己所在的村落，到乡一级的中学就读；在升入高中之后，就可能需要离开所在的乡，到县城中学就读。这样，当谈及家长动员关系网络建立与其子女所在的学校的网络连接时，其网络拓展的范围一般应当是超越了一个村或者乡的界限。在文本上，坚持自己所开展的田野工作是基于一个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所有关于该县的可获得的确切的文本与统计资料都是以县为单位。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的能够帮助我们最直观地了解转型县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其描述的基本单位是县而非村和乡。

转型县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说是中国发展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1978年开始的农业去集体化进程以及对外的开放带来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农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与社会财富同步增长的还有收入分配的差异和地位分配机制的重大变化。转型县居民社会分层的基本状况符合不少研究者对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表2）。市场制度的确立的确带来了经济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上升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的崛起，同时，政治资本的价值也由于市场改革的渐进性不至丧失，这让干部等社会管理者的社会地位优势仍然得以维持（David & Wang, 2009：3-19）。

表2 转型县的劳动力人口与收入

劳动力所在部门	占总人口比例（%）	年均收入（元）
农、林、牧、渔	74.76	4 495
采掘业	0.13	4 310
制造业	6.00	5 883
电力、煤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9	11 640
建筑业	6.59	3 983

结表

劳动力所在部门	占总人口比例（%）	年均收入（元）
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业	0.07	9 49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	2.14	6 652
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	4.45	3 637
金融和保险业	0.21	9 899
房地产业	0.06	9 340
社会服务业	0.89	7 594
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	0.82	10 893
教育、文化事业单位	2.37	9 793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0.002	10 724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1.48	10 772
其他	0.03	5 939

资料来源：县志。

在转型县的调研即部分地以此转型趋势为背景，希望在制度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了解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家长的观点与实践来回答本研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来管窥更广范围内农村居民的经历（费孝通，2009）。在实地调研的工作中，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访谈法，还使用了少量的当地文献。此外，在研究过程中，还撰写了大量的田野日志。在本研究中，文献法是了解转型县社会与教育背景、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的主要手段。主要使用了两类文献，第一类是关于家长参与的政策文本，官方的统计年鉴以及地方志；第二类是地方性的报纸以及该地方相关部门的网络报道。不同家长的学校参与，他们对可以动员的关系网络——例如家庭内部的网络连接、家庭与学校的连接地系统——的价值以及这些关系网络动员的可能性的认识都需要依赖访谈法获得。

关于访谈对象，依照《中国统计年鉴》的技术性规定，将受访

的家长限定为不拥有城镇户口的、居住在城关镇之外地区的转型县居民。在访谈的初始阶段，主要采用的是开放的非正式的入户谈话。访谈对象的选取主要采用的是滚雪球的办法，且数目并未作限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帮助自己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聚焦问题，修正相关概念。滚雪球时，主要是指请求参与者介绍其知道的家庭接受访谈。当然，这种滚雪球的抽样方法也有不足之处——参与者所介绍的往往是自己的熟人，而关系网络连接的同质性可能会使我们接触到的参与者局限在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在访谈的一开始，就努力地拓展自己的关系网络，试图去认识我们在基本研究问题中所提及的每一个社会阶层的家庭，再要求这些家庭介绍各自所知道的家庭接受笔者的访谈。在访谈的后一阶段采用的主要是半开放式的访谈，并且对受访对象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根据目的性抽样的原则，依据前一阶段对参与者背景的掌握缩小访谈范围，将对象限定在那些能够突出社会背景差异，同时能够提供丰富个案信息的家庭。最终选定的家庭有 18 个（表 3）。还对来自部分家庭的学生进行了访谈，也走访了部分学校，对教师进行了访谈，以求证信息。

表 3 家长参与者的基本材料

	背 景	教育程度	子女教育状况
1	干部（乡）	3 年大专	一本
2	干部（村）	3 年大专	二本
3	干部（乡）	4 年本科	二本
4	专业技术人员（教师）	4 年本科	1. 一本；2. 一本*
5	专业技术人员（教师）	4 年本科	1. 一本
6	专业技术人员（教师）	3 年大专	1. 一本；2. 二本
7	专业技术人员（教师）	3 年大专	1. 一本；2. 二本

续表

	背 景	教育程度	子女教育状况
8	个体工商户	高中	1. 一本
9	个体工商户	初中	1. 二本；2. 一本
10	私营企业主	高中	1. 一本；2. 高中在校 * *
11	私营企业主	初中	1. 一本；2. 二本
12	农民（工）	未受学校教育	1. 三本；2. 职业高中
13	农民（工）	未受学校教育	1. 初中；2. 三本
14	农民（工）	未受学校教育	1. 初中；2. 初中；3. 初中
15	农民（工）	小学	1. 一本；2. 初中
16	农民（工）	小学	初中
17	农民	初中	高中
18	农民	初中	职业高中

：1 与 2 代表按顺序排列的两位子女； *：在校表明尚在就读，为非最终学历；其他表明最终学历状况。

在具体访谈过程中，同干部、企业主等人的访谈显得较为正式，因为他们的作息时间为工业化时代和科层制时代的规则所影响。同他们交流的机会少，一般只能和他们见一两次面，每次访谈时间持续在半小时至 1 小时之间。在与他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一般会对谈话加以录音，以方便后期的资料整理工作。由于住在当地，同普通农民的访谈一般都进行多次，很少采用录音的方式，几乎都是事后笔录整理。生活在农村有很多便利，可以经常地与不同的家庭进行谈话，有时的谈话只是短短几分钟，长的也不过一个小时。更长时间的谈话，内容涉及的往往超出研究所需，但是正是在这样的日常交往中，与当地居民才变为熟人，才能彼此分享最诚挚的感受。在内容上，没有将访谈话题聚焦在他们参与子女教育的某一特定阶段（例如小学、中学），而是从不同时期的参与经历谈开。这是

因为，家长的基本行动策略与他们和学校系统的持续互动有关联，某一时期的互动会影响到他们对这一段经历的理解，而家长后续阶段与学校的互动，也正是基于他们先前对参与子女教育的行动的社会意义的建构。比起那些“有单位”的党政干部或者企业主，同农民的访谈稍为复杂，大部分农民常年外出打工，因此，在时间的安排上，刻意将访谈时间放在春节（2008年12月至2009年3月）和农忙（2009年8月至12月间）这两个关键时间段，在这两个时间段，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回家过节或者收割庄稼，因而能够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农忙期间，访谈工作进行得稍微艰难，因为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地里干活。这样，就必须在他们较为空闲的时间找到他们——一般是清晨离家之前、中午吃饭时间，或者晚上。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还撰写了大量的田野日志。所撰写的田野日志，主要有四类：一类为略记（Jottings），主要用它来记录并存储初期访谈时所遇到的每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子女数目以及受教育状况、家庭条件）。当然，它也是记述每个家庭家长相关观点的重要方式。在访谈初期，为了不破坏和每个家长之间的信任关系、不在访谈时制造紧张的气氛、不让参与者感到尴尬或者不舒服，一般选择在访谈结束后回到住处记录相关内容（Bian, et al., 2001; Bian, et al., 2004; Emerson, et al., 1995）。在研究过程中，也坚持写日志（log），用来记录如何计划时间，又如何使用了每天的时间。在每周的开头，都会写下一周的计划，决定要去什么地方、访谈谁。在每天结束时，会记录下去了什么地方、访谈了谁。这些记录让我们已经做了什么以及又有哪些没有做到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它经常促使我们反思应该怎样去改善入户访谈工作。当然，相关的记录也是后期分析资料时提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坚持撰写的另一类田野日志为日记（Diaries）。撰写日志主要是为了记录每天田野工作的心得与体会以及如何感受周围的生活环境。如实记录下田野工作时的种种收获，以及工作遇到挫折时的种种不平——例如，在当地的教育部门拒绝公开本应当向所有人公开的信息时。在资料分析

的阶段，从这些记录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开展此项研究时所可能有的种种态度甚或偏见，能够不断地对自己的身份加以澄清与反思。

研究发现

（一）断裂的制度性连接：学校、家庭与社区

教育系统——学校系统与选拔体系 在转型县，除其所在地的市级电大在当地所设的电大教学点外，没有任何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其教育系统中，主要包含的学校类型有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其中高级职业中学 3 所，普通高中 12 所，普通初级中学 60 所，小学 324 所。在这些学校就读的人口有 15 万，占当地总人口的 16%。根据当地教育部门的统计，转型县小学的毛入学率在 2007 年时就已经达到 99.7% 的水平。高级中学学习的机会则需要经过相对激烈的竞争才能获得（表 4）。可以获得的统计资料表明，在 2007 年，该县能够从初中升入高中的学生仅占当年毕业生人数的 46.2%（表 5）。

表 4 转型县中小学人口数（单位：万人）

时 间	中 学	小 学
2000	6.19	9.46
2001	6.52	9.64
2002	6.52	9.69
2003	7.10	10.89
2004	6.66	10.19

续表

时 间	中 学	小 学
2005	6.81	9.15
2006	7.26	8.47
2007	7.57	8.32
2008	7.51	8.04
2009	7.39	7.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表 5 转型县不同层次学校的平均升学率

层 次	升学率（%）
小学升初中	99.7
初中升高中	46.2

资料来源：当地教育部门统计。

在转型县，教育资源的分配呈现出一定的政治逻辑，在数量和质量上呈现出“县—乡—村”逐渐递减的分配格局。转型县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中心学校管理制度，拥有较强师资的中心初等学校或小学都坐落在当地的行政中心——县或者乡政府的所在地。这样的教育资源分配格局，在普通高级中学的选址上也有所体现。转型县普通高级中学一般都坐落在县城，或者乡政府所在地（一所中学除外），其中省级示范中学坐落在县政府所在地（一所中学除外），市级示范中学坐落在转型县几个下属乡政府所在地。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原则上施行就近入学的原则。也就是说，所有的家庭都需要就近将子女送往本村的小学和中学学习。不过，由于中小学适龄学生人口的锐减，当地的教育部门开始响应中央和省一级政府的号召，撤并中小学校，并将教育资源进一步投入到当地的中心学校（例如，在访谈一所村小的校长时，校长提到，该乡当年分

配的7名大学生中，有4人都被留在了中心学校，只有3名被分配至该乡辖下的小学）。村小和村中学规模的减少和资源投入的进一步降低也使村落中中小学校的部分优秀师资进一步流失。不少住在农村的家庭，开始想办法将孩子送到坐落在乡镇的中心学校就学。为此，不少家庭每月需支付数目不少的交通费用。不过接受访谈的家庭都觉得这笔投入值得，因为进入这些学校意味着他们的子女可以有更多进入高中，甚至是重点高中的机会。

“绩效原则”是普通高中招生的首要标准。转型县的学生若要进入高中，需要参加全县统一的中学入学考试。无疑，拥有更好师资的中心学校的学生有着绝对的更佳的竞争力。择校，亦即以补交一定费用来换取以较低分数入学的办法也是转型县普通高中招生的一条路径。这类学生被称为择校生。通过考试被直接录取的学生则被称为统招生。尽管该县在早先几年就承诺要降低择校生的规模，但是截至2010年时，在各普通高级中学新生中，有30%的学生仍然为择校生——在2007年与2008年，这一数字曾高达50%。

转型县的12所普通高中之中也有分层（表6）。在2009年时，这12所中学中有2所为省级示范中学（1所为原市重点中学，坐落在农村，一所则坐落在县镇），3所为市级示范中学。不同级别的学校当然意味着不同的升学率。学生最想进入（家长最想送自己的子女前往）的也自然是名列前两位的省级示范中学。而省级示范中学又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录取分数。如果想通过择校的方式进入这两所学校，当然也意味着家长需要交纳更高额的择校费用。以进入当地坐落在县镇的省级示范中学为例，要进入这所中学，学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中考的考分达到各校所设定的最低的择校线；二是交纳择校费。家庭所要交纳的择校费额度，其计算公式为：起步基准价格+（统招分数-学生实际获得的考分）×价格系数。起步基准价格亦即学校要求家长所交纳的保底的基本费用，通常为1 000元到5 000元不等；所谓的价格系数，就是家长为学生少考的每一分所需要支付的费用，通常为1 000元。这样，假如当年某考生的中考分数为580分，

他想进入一所重点中学。在这所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为 590 分的情况下（并规定只有中考分数获得 575 分以上的考生才能申请通过择校的形式进入该校），那么这位考生的家庭需要交纳的费用就为 13 000 元。其计算过程为：3 000 元（假定的基准价格）+（590-580）× 1 000=13 000 元。

表 6 转型县不同高中的升学率——三所学校的对比（2008 年）

学校名称	升学率（%）
山顶中学（省级示范，原省重点）	67.10
县中（省级示范，原市重点）	55.70
渡口中学（市级示范，原非重点普通学校）	23.10

注：本文中的所有学校、地点名称均为化名。

资料来源：根据各校提供的数据整理。

教育筛选中“分数”与“择校”双重模式的存在，使得普通家庭在争取教育机会时，面临着双重的策略选择，第一，他们需要创造条件，为子女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赢得更好的智力刺激环境，从而帮助孩子取得更高的分数，以帮助他们一级一级地进入优质的学校，最后获得高考的成功；第二，他们也可在子女成绩稍不如意的情况下，动用家庭的经济和关系资源帮助孩子进入更优质的学校。

模糊的三结合——关于家长参与的政策话语 法律、政策以及相关的政府文件规定了家长与学校教育之间的正式关系。在相关文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家长参与以及其在教育中的角色以家庭教育的话语形式出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被看作是有充分的理由相结合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被看作是“大教育”概念中不可分割的不同部分。例如《中小学管理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教育委员会令第26号，1996年3月9日发布）明确提出：

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学校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更加紧密结合的新格局。

学校、家庭与社区的“三结合”被认为会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不过，在“三结合”的话语中，学校、家庭与社区三者的地位明确：

发挥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努力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调一致，互相配合，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中小学管理规程》）

学校被看作是正规教育实施的唯一合法与专业的机构。而家庭与社区则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其主要的角色在于给学校的运作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其参与学校教育的内容亦不涉及知识的传授，而主要关涉德育工作。因而，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也在于“配合”和“支持”教师和学校的工作。家庭与家长在教育中的辅助性角色不仅体现在其参与学校教育的给定方式上，还在于其对学校教育的服从，它被看作是应当接受学校的监督的，家长需要通过学校的“指导”，“掌握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以“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有限角色——教师关于家长参与的声音 教师基本上认同上述政策文本中有关家长参与的观点。在转型县，接受访谈的教师都说对于家长参与，他们没有任何硬性的规定与要求，不过他们认为，家长的参与对学校教育而言有着一定的意义。当问及在何种情况下，由于何种原因他们会要求或者鼓励家长参与时，他们做出了详细的回答。根据他们的回答，我们可以列出两种正式的家长参与。

其中一种可以称之为支持性参与。其首要目的在于保证学生的学业成就。教师将学校教育的中心置于学生的学业成就上。他们期望家长能够在必要时支持教师的工作。支持的第一个方面是指信息提供。例如当学生的成绩出现波动情况时，家长能够给教师提供相关的信息，以方便教师对学生成绩出现的变化进行诊断。教师期望通过家长了解学生的相关信息，从而知道学生学业成绩下降的原因。例如，在走访坐落在转型县临港镇的渡口中学时，一位班主任就提到：

家长嘛，就是有时候学生出了点问题的时候，成绩不太正常的时候，我们要找找（他们）。一般就是打电话，主要就是问问看，他们家里是不是有点问题，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孩子的成绩下降了）。比方说，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个学生，本来成绩挺不错的，但是突然成绩就下降了，后来我就打电话去家里问啊。就知道了，原来他家里的确有事，父母关系出了点问题。（TH3）^①

支持的第二个方面是指对学生的监管。教师希望家长能够监管孩子的行为，共同预防学生因为某些原因，例如沉迷网络、加入不良团体等而荒废学业。从以上两个方面不难看出，家长在教育中的角色主要被看作是辅助性的。例如，在信息的传递方面，家长处于被动的境地——只有在学生的成绩出现变化时，才要求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在监管方面，被认为是“纯”的学业事务，家长无须过问，而只需做好外围的“保障”工作。家长的外围性角色，在学生违规事件的处

① 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笔者对所有受访者都进行了编号，对于教师参与者，编号的基本规则为首位字母为教师职业（Teacher的首字母T），第二位字母为教师的工作地点（H为学校名），第三位为数字，主要代表的意思是，我接触到的第几位教师。对于家长，其编码则主要由两位数字组成，第一位为字母，第二位为数字。字母即为拼音 Jia Zhang（家长）的首字母，后面的数字为家庭的顺序编号。

理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转型县山顶中学进行访谈时，接受访谈的一位班主任就提到自己曾处理的一个学生违规事件：

那个学生就是突然有好几天就不来上课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第一天就开始去找。以为他家里出了点事。后来才知道，他去上网，不回来。我就打电话给家长说，好，你过来，把孩子领回家。直接就把结果告诉他了，让他孩子退学。(TH2)

在转型县，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官方渠道主要有家长会、成绩通知单的发送以及家访。对于通过这些方式所能获得的资源（信息或者其他干预孩子学习的机会），家长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成绩通知单主要的功能在于向家长通报学生的学业成绩。一份典型的成绩通知单，一般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一部分为学生在期中或者期末考试中所获得的成绩，另一部分则为教师对学生的简要评语。对于家长而言，这样的信息往往内容有限。教师也自认为这样的通知：

自上而下的意味明显，家长们只能听听教师说了什么。对于其他他们可能想要知道的信息往往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TH1)

在转型县，能参与家长会的家长数目也非常有限。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为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物理距离——由于每个学校的学生通常来自各个乡镇或村，且不少家长常年外出打工，他们没有办法经常性地参与学校组织的家长会活动。第二个原因则和转型县学校对家长会的定位有关。在转型县，家长会的仪式意义通常要大于其实质功能——学校通常将家长会看作是表扬优秀学生、激励家长鼓励孩子努力学习的场合。一般来说，能够被邀请参加家长会的家庭，往往是那些学业成绩优秀的学生的家庭，教师们期望让家长们看到，自己被邀请参与学校组织的家长会是一种荣誉，在这种荣誉的刺

激下，他们能够更好地鼓励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在县中所作的访谈中，一位教师就提到：

去年，我们搞了两次（家长会）。我们让 40 个家长来学校。老师们就向家长分析了为什么有些学生成绩好，有些就是上不去。我们还让两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在会上作了发言。他们的家长当然感到非常光荣、开心。我想这肯定能激励家长再去推着孩子学，让他们更努力一点。（TZ1）

在转型县，学校组织的学生家访活动其对象范围通常也非常有限。物理距离通常是制约教师选择受访家庭的首要因素，教师更愿意访问的家庭往往是那些居住地离学校更近的家庭。教师家庭访问的对象还有另外两类家庭：一类为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的家庭——对于这类学生来说，家庭访问的符号（奖励）意味明显；另一类则为成绩出现较大波动的学生的家庭——教师们访问这类家庭的首要目的在于了解学生的家庭状况，了解学生学业成绩出现问题的可能解释性因素。在渡口中学的一次访谈中，一位班主任曾提到自己的一次家庭访问故事：

有个学生，平时成绩很好。我们老师都觉得他以后肯定不错的（要进入好大学）。但是有段时间成绩就突然下降了，而且下降得很厉害。我就去了他家里。去了当时就有些震惊。当时是第一次才知道，原来，他（的家庭）是个单亲家庭。（他）父亲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但他从小成绩一直很好，很优秀。他的妈妈告诉我，他很听话，那最近为什么成绩下来了，可能就是因为她生病了。然后他也很迷茫，上大学以后怎么办，家里的负担增加了，她妈妈是不是能够担负起本来就很沉重的家庭重担。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我就开始做这个学生的思想工作……（TH1）

通过对教育系统的分析，以及对相关法律文本的解释，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到：教育系统赋予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不少的空间——各类法律与政策文本都肯定了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重要意义；不过，对于家长怎样参与学校教育，法律和相关政策文本却没有作任何清晰而细致的规定。转型县的学校也没有建立多少正式的渠道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家长的参与，一般而言，被看作是在学校主导下的，对学校教育的辅助与补充。在这种话语体系下，通过家长的参与，通过家长与子女之间，或者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网络传递的资源是既定的，家庭进行网络动员的方式也是既定的。

不过，家长对此是否认同，他们对家庭与学校在子女教育事务上的分工认知如何？他们对于自己在子女教育中角色的认知又如何？他们又会采取何种策略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需要倾听家长的声音。

（二）重构家校连接：关系使用作为一种策略

一般农民：亲属关系的再生产和对教师的依赖 所有的家长都将自己参与子女教育的最基本的角色视为提供给孩子足够的营养和舒适的居住环境，他们认为，这样孩子就能获得好的学习环境和智力刺激。而假如自己能够在家并维持家庭代际间网络连接的完整性，这些就有可能办到。例如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家长（J14）就提到：

我在家，做做饭，洗洗衣服，让孩子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他学习应该就会好一点。我们家长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他们也认为与孩子间的密切联系有助于传递给孩子自己的教育期待，给予孩子适度的感情支持，并保持对孩子的监督与管理，这些都是帮助孩子获得更好的学业成绩的必要条件。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家长（J14）在接受访谈时曾经提到：

我那个时候，外出打工——和她妈妈都是。我们在上海工作。我在工地做事。她妈妈在工地帮助老板烧烧饭。她奶奶在家带她，怕她在家不学习，我就经常给她打电话，问她学习情况怎么样。跟她说，我们有多期望她能够上大学。

尽管所有的家长都认为，代际间网络的完整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维持这种互动关系。社会背景不同，孩子与父母间的联系明显不同。通过访谈资料的量化分析，可以看出，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新型经济精英（个体工商户与私人企业主背景）家庭的家长（表7），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更有可能在家，也更有可能与孩子在学习事务上保持必要的联系与沟通。尽管通过对定性访谈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的量化分析并不能够作为推测更广范围的相应背景的人口的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孩子与父母间关系的态势在农村社会是非常普遍的。

从全国性以及该地区县级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来看，一般的农民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干部、技术人员或私人企业主与个体工商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在的经济机遇正驱使更多的农民走出自己的家乡。在同当地农村一所小学校长的攀谈中，他提及：

我们学校的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他们要么自己照顾自己，要么是由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的父母在不同的城市打工，根本没有办法照看自己的孩子。

表7 父母与子女的联系情况（单位：户）

	父母都在家	父亲或母亲在家	父母都外出打工
干部/专业技术人员/ 新的经济精英家庭	9	2	0
一般农民家庭	1	2	4

不过，一般农民也并非消极的社会结构性压力的牺牲品，他们是积极的社会行动者。正如不少参与者所言，他们自己外出打工，以积累家庭财富、赚取家庭生活所需和孩子学习的学费，为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例如在访谈时，有家长（J15）提到：

我觉得孩子学习条件总不好，打工的时候看见城市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独立的卧室，写字台，可以看书学习。我们家连个房子都是破的。我就出去打工，做事。你看，现在我们家也造了新的房子。我给孩子做了独立的房间，给他买了书桌。我们自己的房间，我都没有粉刷。但是，孩子的房间，我都给刷上了白色的墙（让他的房间更明亮，方便学习）。

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祖辈，期望祖辈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照顾与监督。但是，祖辈的监督，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一位参与者（J13）就提到：

奶奶总是惯着（溺爱）她，我们不在家，电视也给她看。偶尔说说（不许看电视）。

有参与者甚至提到，祖辈缺乏足够的知识来教育孩子：

奶奶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让她学习），也比较封建，认为女孩子不用学习，反正以后都是要嫁人的。（J14）

农民参与者深知这点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提到，他们会经常打电话回家，期望能够通过电话给孩子足够的鼓励，传递给孩子自己的殷切期望，甚至现身说法，以自己在都市的窘迫遭遇来教育孩子通过学习获得成功对于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意义：

我就告诉他们（儿子，女儿），我在上海打工的时候，第一次去，不认识字，结果迷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不认识公交路牌（站点名称）。我在工厂打工的时候，像我这种不识字的，工资比人家高中的要低。我告诉他们得好好学习，跳出农门。（J14）

不少一般农民参与者还提到，为了帮助孩子的学习，他们还积极地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网络。他们利用亲戚之间关系网络的情形有三种。第一种为，自己外出打工的时候，将孩子托付给没有外出打工的亲戚照料。不过，家长坦言，这种情况非常受家族政治和小家庭氛围的影响：

我出去的时候，就把女儿放到舅舅家了。因为他（老公）兄弟这边不行，关系不太好。不过放到舅舅家也没有多久，不是很放心。自己的弟弟总是可以的，但是舅妈那边不行。可能觉得我女儿拖累了她。（J16）

第二种为，通过亲戚之间的交流，为孩子的学习获取有用的信息，或者直接向亲戚为孩子寻求直接的学习支持，例如有个农民家长（J15）就提到：

我舅舅的儿子在读大学，我就经常问他，孩子要怎么教啊。你是怎么弄的。这个挺好的。他儿子放暑假回家，我就把孩子送过去，让他孩子帮我辅导一下。人家上过大学的。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还打电话给他，问他孩子怎么填志愿，让他帮助参谋一下。

第三种情形为，在必要时，动员亲属关系网络来与孩子的教师建立联系，他们期望这种联系能够为孩子带来一些助益——例如能够与

老师就孩子的学习情形做经常性的交流，以期监督孩子的学业进展。这种情形，在孩子上高中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有参与者就提到，为了能够经常了解到孩子的学习情况，他（J12）就主动通过亲戚联系过教师：

孩子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学校就在门口（家附近）。（但孩子）上高中了，就远了。小学、初中的时候，（学校的）老师还算是门口人（邻居），但是高中的时候，学校太远了，老师太远了。（和老师）也不熟悉，孩子在学校干什么你也不知道。我就想找找老师，但是人家无缘无故的肯定不会帮你。我就找我的大伯，他是门口一个中学的校长，和其他学校的校长都挺熟悉（和孩子学校的校长应该也很熟），然后让他领着，见了校长，见了班主任，班主任就介绍给老师。我和班主任就经常联系，打电话问孩子的学习情况，期望他能照顾照顾我的孩子。

不过，这种私人关系动员的基本方式，在一般农民看来，实在颇费周章，而且经常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例如要与班主任建立私人网络，按照地方的礼节，他们须馈赠“人情”，即礼品，例如烟、酒。对他们而言，这往往花费不菲：

我自己就抽两块钱一包的烟。但是见老师，怎么也得带点好烟吧，几百块一条，觉得太贵了，我一年才赚万把块，一家的生活费加上孩子的学费，还有邻居亲戚，哪家有什么事（结婚、生孩子、葬礼）都得花钱送“人情”啊。一年下来剩不了多少。（J13）

因此，对于一般农民而言，他们在与教师取得联系之前，总有个理性的盘算：

他学习要是好，那我就去学校了。看看老师，让老师多照顾照顾，但是要是不好，去了不是白去？还花钱了不是？不划算啊。(J17)

经济投入的压力只是家长参与学校教育路上的部分障碍。文化知识的匮乏也是限制一般农民积极行动的另一项结构性压力。例如，几乎所有的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家长都将教育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教师，他们认为教师是专业工作者，接受过系统的培训，而孩子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J18)：

那他要怎么样（能不能上大学），还不主要看他自己，还要看老师，要他们加起来（才有用）。我们没有用的。

他们亦依赖教师在教育方面的专业技能。他们坦言自己缺乏学校教育经历，无法指导孩子的学业。有位来自一般农民的家长(J16)就提到：

她（孩子）上了高中过后，基本上就不听我的话了。我也不懂他们（学校）教的东西，只好拜托老师了。

干部与技术人员：家庭，以及与同事、朋友关系的再生产 干部与技术人员，对此颇不认同。比起一般的农民家庭，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新型经济精英家庭的家长更有可能长期在家，他们一般有稳定的职业和不错的收入，少有外出打工的压力与意愿。在这些家庭里，家庭关系保存得较为完整，父母能够在放学后监督与管理孩子的学习。一位来自干部家庭的家长(J8)就提到：

我发现我的许多邻居都外出打工了。他们的孩子都在家，却没有人照顾。有时候我甚至发现这些孩子深夜打扑克。许多人都

上不了大学，因为他们整天就知道玩。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必须待在家，照看孩子，多注意孩子的学习。

相较而言，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孩子，劣势明显。尤其是那些常年外出打工的家长，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让孩子跟随自己进入城市的学校或优质学校。他们的孩子长期处于无人照料、无人管理的状况。对于那些没有外出打工或者能够让父母中的一方（一般为女性）在家照看子女的一般农民家庭，情况显然也要更有利些。不过，这些家庭依然要承受经济方面的压力，面临两难困境。一位农民家长（J16）就提到：

我必须外出工作，不然的话，假如我的孩子考上高中，或者考上大学，还得花钱，那就没有办法供他们了。但是，假如外出打工的话，他们就没有人管，我妈妈在家管他们，没有什么用，有很多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自己管自己。

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父母，认为必要时，他们还可以给予孩子一定的学业指导，他们坦言，甚至可以依据自己的学校教育经历告诉子女如何学习、如何适应学校的生活，而这样对子女的学习帮助更大。一位干部家长曾提到自己教育女儿的经历：

我女儿，（上高中）那个时候第一次离家。她要独立生活了，还要自己面对同学和学校的老师。她住校，每个礼拜回家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就问问她，学习怎么样，问问她和同学关系处理得怎样。我说她要学着和同学处理好关系。知道怎么和老师打交道……（J1）

通过家庭内部的关系网络，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对子女而言有意义的社会资本，只是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为子女获得教育优势所使用的

策略之一。此外，他们还经常提到动员朋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网络，并认为这些网络为孩子带来了一定的优势。他们提到，通过这些关系网络，他们能够建立与孩子教师的联系，并通过这些联系获得孩子在校的相关信息，例如，一位教师（J1）就提到：

我儿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我就不怎么认识了。我就找我的同事，让他帮我看看有没有熟人在那里做老师。然后刘老师（一个同事）就有个熟人在那里工作。我就通过这个关系认识了孩子的班主任。后来就经常和他打打电话，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

通过这些信息，他们可以决定是否需要在必要时给予孩子一定的学业支持，甚至聘请私人辅导教师。一位干部家长就提到：

我就经常打电话给老师，问成绩。问他哪科成绩比较差。（就得知）孩子物理不行。我就问老师该怎么办，老师建议我给孩子找家教。

他们也提到，在私人辅导教师聘请的过程中，同事和朋友关系的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第一重意义在于，通过同事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网络，他们能够了解到当地家教市场的基本情况，从而准确地判断不同辅导教师的质量。关系动员的第二重意义源于该县家教市场的欠发达特征。在转型县，大部分从事辅导工作的人员为不同类型学校的在职和退休教师。被访者中，有聘请私人辅导教师经历的家长都反映说他们一般在孩子进入初中阶段以后开始为孩子聘请辅导教师——因为此时他们开始面临升学压力。从对教师的访谈结果来看，初中教师从事辅导工作的意愿稍强，高中教师由于工作以及收入稳定，从事辅导工作的意愿稍弱。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假如要为孩子聘请辅导教师，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辅导教师，他们就需要动员关系网络。家长们认为，同教师之间的强社会关系，能够保证聘请成功的概

率——因为教师会觉得无法推脱“朋友所托”，否则就可能不近人情。当然，在家长们看来强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会加强他们与教师彼此之间的信任。在2009年1月，与两位携带礼物来到正访谈的教师家中，请求这位和他熟络的教师帮助寻找英语辅导教师的家长进行了简短的会话，问道：

您为甚要找S教师？

受访的家长回答道：

要找信得过的（老师），不然不放心把孩子给他（教），最主要的，我不认识人啊，得有关系才行，不然老师不愿意做的啊。

对于来自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家庭的家长，他们自觉与教师属于同一社会圈子，有相同的身份。因此能够较为容易地找到连接他们与教师的中间桥梁，并通过这种策略与教师建立强的社会连接系统。一位从事教师工作的家长（J6）就提到：

我是教师嘛。我的同事、朋友都是教师。我们间接和直接地都有联系啊。

另外一位来自干部家庭的家长（J2）还提到：

我们都差不多吧，都是吃公家饭的，小圈子嘛。

新型的经济精英：社区以及与教师关系的生产 家长们还谈到相互之间网络连接及其可能的价值。他们认为家长之间假如能够就孩子（尤其是处于相同学习阶段在同一学校的孩子）的学习状况进行交

流，彼此就会有更多机会就孩子的学习状况与教育方法进行沟通。但是所有的家长都坦言，他们更倾向于同熟人、朋友和亲戚这些有强关系网络连接的人沟通这类问题。而当孩子进入离家稍远的初中，或者更远的高中，对传统的地缘和亲缘关系更为依赖的一般农民家庭就遇到更多的沟通困难。他们一般都回答说，随着孩子不断地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他们与学校的其他家长之间的联系就越来越少。而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新型经济精英家庭的家长则非如此。他们通过工作和经济活动结成的关系网络要更为宽广。

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家长还谈及社区对孩子监督功能的弱化。由于外出打工而造成的社区人口大量流动使得农村一般只留下少量的年轻人与大量的老人与小孩，他们无法结成密切的关系网络，监督孩子的行为。而来自于优势阶层的家庭，由于大部分渐渐地移居到离农村稍有距离的乡，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稍微封闭的居住圈。他们聚居所形成的社区，较少有家长外出打工，彼此间所形成的关系圈有利于实现对子女的监管。

学生进入学校，尤其是高中之后，与家庭和家庭所在社区的联系逐渐变少。家长对学校的直接参与、与学校的联系变得越来越重要。所有的家长都认为与学校保持一定的联系有着相当程度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这种联系与教师互通信息，让自己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业与生活状况，也可以让教师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子女。他们还希望教师能够给自己的孩子一定的关心与爱护。

不过，来自农村的一般农民家庭，却较少与教师保持联系。他们关于家校联系的回忆多局限于成绩通知单、家长会或者家访，或者是处理孩子行为问题的经验。而来自其他家庭的大部分家长则回答说，他们与教师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联系，而且这些联系往往并不一定通过家长会、家访等方式实现。他们更愿意与教师保持某种程度的私人关系。认为可以通过这种关系让教师了解自己子女的学业成就状况，能够通过与教师的联系了解孩子的相关表现，并在必要时与孩子取得联系，监督孩子。他们也认为这种与教师的联系能够让孩子更觉得自己

关心他们的学业，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

对于来自新型经济精英家庭的家长，他们甚至表明自己会在必要时选择陪读。这类家长一般选择在孩子进入高中阶段之后、孩子需要住校时，在孩子就读的学校周边租房。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自己监督孩子的学业。

一位私营企业主家长（J10）还提到，陪读为孩子节约了学习时间：

我就让他妈妈去陪读，租的老师的房子。他妈妈给他洗衣服。

更重要的，他认为陪读还创造了为孩子提供更好的营养从而创造更好的智力刺激的机会：

他妈妈就在那里，给他烧饭，做点好吃的，买点荤菜，这样营养会好些。

甚至有了与老师建立私人关系的机会。而与教师间关系网络的建立，则为他们监督孩子、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创造了机会。

我们就住学校附近啊，经常能碰到老师，就跟着老师问啊。老师和我也就熟悉了。孩子在学校里表现怎么样，我也就比较清楚了。

而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家长，则坦言他们没有经济条件陪读。一个农民家长（J12）算了一笔经济账：

现在陪读的人多了，在学校边上租房，价格也涨了，以前大概 800 块一年，现在贵的要三四千。我一年收入也不过 1 万块。

孩子上学还要学费。没有办法做。

另外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家长（J17），谈起孩子的学习经历，颇为愧疚也带遗憾地提起他的心酸往事：

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当时孩子学习不好，肯定是营养不行，他说他上课天天打瞌睡。我当时说，我让他妈妈去陪读，他说不要了，家里比较苦（没钱），陪读了，不能做农活（赚钱）了不算，还要租房花钱。我就没（让他妈）去，结果他成绩总是上不去。我觉得是营养不好，我没做好。

新型的经济精英非常强调与教师建立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接近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认为有必要通过这类关系网络来了解孩子的学业信息，监督孩子在校的表现，向孩子的教师交代孩子在家的有关表现，或者为孩子寻找辅导教师。他们有强烈的参与学校教育的愿望，认为自己短期积累的财富，并不足以保证自身获得应有的社会声望，他们期望孩子获得好的学业成就。一位私营企业主（J11）提到：

我们不是有句古话嘛，富不过三代，国外也有句话，叫作三代才能出个贵族，要成为贵族，（光赚钱不行）要把孩子培养出来。

对于新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现实在名牌大学与未来地位之间所建构的关联，他们心知肚明，强烈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子女的教育优势。他们有强烈的身份意识，自知较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与教师的网络连接尚有不足，但是，他们愿意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以建立与教师之间的私人关系。一位个体工商户家长（J9）就提到：

他们（老师和干部）都是国家单位里的人，我们还是不一样。不过，为了孩子的学习，我挺愿意花钱的。

送礼与请老师吃饭是与教师建立私人关系的两个基本策略。与教师建立私人关系的家长说他们选择送礼的时间点是春节之后、学校开学之前。在对教师被访者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教师也陈述如此。家长选择在传统节日前后送礼，至少表明他们将与教师间关系的建立视为一种私人关系的生产。这从送礼的内容中也可窥见一二。家长们陈述说，他们所买的礼物一般为一瓶白酒与两条香烟——这是转型县亲朋好友之间节日互访的标准礼品。可以看出，家长们希望通过在传统节日期间送礼这一象征性的社会行动向教师传达一种意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私人关系，如同亲友，彼此间有不可推卸的义务。而在开学之前送礼，只为能够顺利找到教师。一位个体工商户家长（J8）就提到：

我是开学前，过年后送给老师的。也不算什么。我觉得就是对老师表示尊重，表明我尊重他，也表明我和他关系很好，期望他能够多给我的孩子点照顾。

而对于一般的农业劳动者而言，这种私人关系的投资常常是无法负担的。一位受访农民（J12）就告诉我他与教师的交往经历：

一开始的时候——孩子刚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去去（看看老师），去的时候，带一条烟吧。一条烟 200 块吧。后来不去了，因为收入差了点（负担不了）。

假如对请教师吃饭这样社会性交往行动进行细节分析，我们基本可见同样的规律，家长们大多选择在节假日前后请老师吃饭。在笔者以教师同事身份参与的同性质质的宴请并进行观察的有限场合中，宴

席的安排基本呈现私人关系生产的逻辑，家长们将孩子的班主任和任课教师请至宴席，并刻意安排村中或者乡中与自己稍微熟络的有名望的社会人士或者官员共同参与宴席，以彰显自己安排了与教师有着对等社会地位的人士招待他们，以示尊重。

对于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家长，这种应酬当然不可想象。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家长（J16）就提到：

一顿饭要花个1 000块吧。我和他妈妈一年赚剩下的（净收入）也不过几千块。一顿饭就这么多，那肯定不行了。

（三）结果：学业优势或劣势的再生产如何可能

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家长们使用不同的策略，通过不同的私人关系网络与学校得以相连。这些网络成为他们进行资本转化，为孩子创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他们进行资本转化的诸种策略到底又通过何种机制与教育结果得以相连？

厌学与升学 通过对访谈数据的分析发现，较少的社会资本一般总是与厌学与辍学相联。从那些完成初中阶段学习即选择退学的学生身上，我们清晰可见这个基本的动力机制。例如，在一户接受访谈的农民家庭，问及户主三个女儿基本的学校教育轨迹，户主说她们三人全部初中毕业即选择不再上学。他让在身旁的三个女儿叙述原因。这三个女孩全部提及在父母外出打工，三个人相依为命的日子：当时三个人在不同的年级，由不足14岁的姐姐照料两个妹妹。当谈及学习时，她们都说：

对学习没什么兴趣，觉得很难，听不懂，上课就睡觉了。回家就自己管自己，想玩就玩。

缺乏监督只是导致她们成绩下降并最终对学习失去兴趣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她们都提及在遇到学习困难时，根本没有人可以帮助自己。

诸多来自农村的同龄人，与这三个女孩有着类似遭遇。只不过，有些孩子可能走得更远。在转型县，由于外出打工人口的增多，农村社会的空巢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传统的社区网络已经无法再对孩子的行动进行有效的限制，受访的一位中学校长就提到：

家长都出去（打工）了，孩子又没有人管，他们就三五成群，经常打架。不学习。（TF2）

一位老师认为这可以从孩子的情感需要上得到解释：

这些孩子，情感上得不到寄托就去找那些所谓的社会上混的大哥哥、大姐姐。到一个帮里去，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也确实给了他们一定的心里慰藉。（TH5）

只不过，这种慰藉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代价太大。

择校 父母与教师间私人关系网络的建立与维持，显然为来自优势背景家庭的家长带来了一定的择校优势。这种优势有两条基本的生成机制。首先与教师的私人关系连接系统可以为家长的择校行为提供足够的参考信息。例如，一位来自干部家庭的被访者（J2）就提到：

择校不是只选个学校啊，还有班级，你得选个教师都比较好的班。这样孩子就等于在好学校的重点班学习了，对吧？当时我的孩子，可以进两所学校。我想那这两所学校差不多。我要选个好班。我就托同事打听，听说1（化名）校有个班师资配备很好。而且刚好我有个熟人的朋友在那做班主任，我觉得把孩子放到那里肯定放心（就把孩子送过去了）。

不过私人关系更重要的一层作用在于影响那个最终能够决定孩子去向的关键决策者。接受访谈的一位私营企业主（J10）提到：

孩子当时中考刚结束，考得还行，我想让他进最好的中学。差了几分而已。不知道怎么办，实在没什么熟人在那里。我就找一个在初中的老师，让他帮忙找他的朋友。当时就得知他朋友的爸爸是那个学校的前任副校长。不过，那个时候刚好生病了，在住院。这个老师就让我一起去看他，买点补品看看他，说说这个事情。结果最后还真把这个事情办成了。

对于那些没有这种关系网络的一般农民家长，孩子的求学之路要简单得多，家长可改变的也少得多：

中考结束了，成绩一般般，拿点钱能上个差学校，就去了。（J18）

老师的关照 “关照”是转型县的家长口头常挂的一个词，他们都期望通过私人关系的建立，老师能够给予自己的孩子一定的“关照”。至于在教育情境中其被赋予了何种含义以及其指向何种优势生成的动力机制，笔者试图简述一二。

当要求教师阐释他们如何理解家长所谓的关照以及在家长的要求下可以给予孩子何种关照时，教师说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期望”。他们说，当家长主动地与他们进行沟通时，他们就能感受到家长对孩子学业成就的期待，与此同时，他们也愿意将这种期待传递给相关人士的孩子。当问及他们如何传递这种期待时，教师列了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找孩子谈话，说说家长对他的期望，他们这个年纪了，有点反叛，但是对老师的话，在农村里有这个习惯，总要尊重点——我们是知识人嘛。他们不听家长的，但是会听我们的。

我也说说我对他的期望，这往往能够调动他（学习的动机）——觉得我是在重视他，是个可造之才。

另一种就是上课的时候，多找他回答问题，鼓励他，让他有精神（兴趣）学习。（TH3）

关照的另一重含义在于“投入更多的注意力”，正如一位教师所言：

这种关系让我总感觉，家长在盯着我，看孩子的表现。我觉得要多给他孩子一点监督，上课的时候也多给他点机会回答问题，参与课堂互动。（TH4）

另一个教师则提到了自己由于这种关系网络获得了更多的关于个别学生的信息，依据这些信息他便能够给予孩子更为个性化的教育——这是“注意”的另一重内涵：

我和他爸爸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爸爸就介绍他给我，给我说他的长处、短处。说他胆小，不知道怎么办。我当时就想，我让他做班长，逼他和别人交往，锻炼他。效果真的挺好，这个孩子毕业的时候，胆大很多。同时由于精神面貌更为正面，积极，成绩也上去很多。（高考的时候）考了个好大学。（TF1）

总结与讨论：家长参与、关系排斥 与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农村社会的分层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上升以及不同的家庭对

高等教育机会的激烈竞争，也造就了具有不同资本和行动能力的家庭（Debrauw & Rozelle, 2007: 207 - 223; Zhao & Zhou, 2007: 224 - 247; 吴愈晓, 2010）。在本研究中，笔者对在转型县实地调研获得的资料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主张作为家庭资源动员的过程维度，家长参与在普通人教育获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

借助资本转换的概念来理解家长参与现象，强调制度与家庭策略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认为当前的制度背景赋予了家长参与独特的资本潜力。发现在当前，正式的学校制度并未提供足够的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渠道，这导致了学校与家庭之间制度性连接系统的缺失。而这一空白的制度性空间则由有着不同行动能力的家长动员私人关系予以填充。也正是由此，社会的结构性逻辑得以在学校教育的空间内生产与演绎：干部以及新型的经济精英由于感受到了较少的经济压力，能够维持家庭内部的完整，在家给予子女更多的监督、感情支持以及学业辅导，他们的社区也能保持完整，由于工作的原因，关系网络也更为宽广；而一般农民迫于经济压力，多数需外出打工，无法在家监督与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与教师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获取更为充分的信息，从而监督与帮助孩子的学习，同时，由于没有或很少接受与经历过学校教育，即便不用外出打工，他们也无法给予孩子一定的课业辅导。由于正式的家校网络的刚性要求，家长一般更倾向求助私人的关系网络同教师保持联系。而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家长由于感受到与教师的地位差异以及关系动员的困难，一般不知道如何同学校的教师进行沟通与交流；他们更习惯于求助“熟人”网络，这种关系选择偏好更受地缘以及亲缘关系的限制。关系网络的同质性以及跨阶层交往的巨大代价使他们也丧失了来自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新型的经济精英家庭通过与教师的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了解、监督、改善孩子学业，以及争取重点学校学额以及教师关照的机会。

本研究特别强调了社会对国家学校的渗透以及社会的结构性逻辑在学校教育空间内的生产。传统上，教育学界将学校制度在近、现代农村社会的建立看作是国家力量对农村社会的无限制侵入（司洪昌，

2009)；而当今农村教育的诸种问题也可归结于此（钱理群，刘铁芳，2008）。但是，笔者在转型县的研究表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在农村社会的建立至少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两股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在笔者开展田野工作的转型县，私人关系不仅反向渗透入学校教育空间，而且还以自身的逻辑来重塑学校教育的结果。这与曹诗弟等人对近代中国教育历史的观察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Thogersen, 2002）。这一点提醒我们注意，当代农村教育的诸种问题，已经不能再化约为国家力量单方面作用的结果，它们很可能是多方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

本研究还强调了在家庭内部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向对学生而言有重要教育意义的社会资本的转变过程中网络动员的重要性。这一逻辑本身强调了社会人的能动性。其潜在含义是，即便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家长在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方面有所欠缺，但是假如他们能够积极地动员社会网络，这些家长依然有机会为子女创生一定的社会资本，仍然有可能为子女争取一定的教育机会优势。这与不少针对中国“关系”现象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一致之处——这些研究一般都有个内隐的假设，那就是“关系无界”——关系本身可以跨越阶层的界限，从而成为不少处于底层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借力的社会行动资源（费孝通，2009；边燕杰，2010）。的确，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也发现过这样的案例：一些农民通过亲缘关系的反复动员成功地为子女创造了一定的学业优势。但是，研究也同样发现，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在传统的亲缘关系网络之外，还能动员其他类型的关系网络（例如通过工作关系结成的网络），而这是一般农民所无法做到的——一般农民的劣势明显可见。此外，同样是动员亲属关系网络，一般农民也经常反映无关系可用。这一点，可能正印证了林南等人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地位分配机制变化的研究：不少已经获得地位优势的人正是通过亲缘关系网络获得自身的地位优势。那些被抛在社会底层的人本来就无关系可用，在后续的地位竞争之中，他们又何谈再通过关系来超越社会的结构性限制呢？对策略的强调，却最终突出了社会的结构性逻辑，这不能不说是个令人失望的命题。不过，也正是这种结构约束与行动

者策略之间的纠葛形态才显示出社会再生产的复杂性。而由此亦可理解为何来自一般农民家庭的家长会被排除在一定的机会结构之外。

参考文献

- Ball, S. J. 2003. *Class strategies and the education market: The middle classes and social advan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Falmer.
- Bian, Y. 1997. "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 Indirect ties, network bridges, and job searches i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3).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E. Richardson (eds.),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 94 (1).
- Collins, R. 1971.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6).
- Davis, D, & Wang, F. 2009. "Poverty and wealth in postsocialist China: an overview", In D. Deborah & F. Wang (Eds.),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brauw, A, & Rozelle, S. 2007.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In E. Hannum & A.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Desforges, C, & Abouchaar, A. 2007. *The impact of parental involvement, parental support and family education on pupil achievement and adjustment A review of literature*. Nottingham: Queen's Printer.
- Emerson, R M, Fretz, R I, & Shaw, L. L.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ei, X, Hamilton, G, & Wang, Z. 1992.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 translation of Fei Xiaotong's Xiangtu Zhongguo,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epilogue*. 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tterman, D M. 2000.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Thousand Oak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 Gold, T, Guthrie, D, & Wank, D. 2002. *Social conn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s, culture,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Guanx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6).
- Hammersley, M. 2004. *Reading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critical guide*. New York: Longman.
- Hannum, E. 1999.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urban-rural gap in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1949-1990,"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2 (2).
- Hsing, Y. 1996.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southern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28.
- Kipnis, A. 1997.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areau, A. 1987.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 - 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 (2).
- Li, W, Park, A, & Wang, S. 2007. "School Equity in Rural China". In E. Hannum & A.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Lin, N. 2002.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2000, "Inequality in soci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9 (6).
- Massey, D. 2003. *The source of the river: The social origins of freshmen at America's selectiv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s in Sociology*, 24 (1).
- Runciman, W, & Matthews, E. 1978. *Max Weber: Selections in translation*. Cambridge, London, New York,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vit & Pierce. 1991. "Sibship Siz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Nuclear and Extended Families: Arabs and Jews in Isra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3).
- Smart, A, & Smart, J. 1998. "Transnational social networks and negotiated identities

- in interac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In M. P. Smith & L. E. Guarnizo (Eds.), *Transnationalism from below*,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Stig Thøgersen. 2002, *A County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Seen from the Village Schools of Zouping, Shand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zelenyi, I. 197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1).
- Zhao, W., & Zhou, X. 2007. Returns to education in urba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reassessment and reconceptualization. In E. Hannum & A. Park, ed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Zhou, M., & Kim, S. 2006. Community forces,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The case of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and Korean immigrant communiti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76 (1).
- Zhou, X. 2004.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 - 1994*.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边燕杰. 2010. 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3).
- 费孝通. 2009. 乡土中国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 梁漱溟. 2003. 中国文化要义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钱理群, 刘铁芳. 2008.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 [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司洪昌. 2009. 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的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王伟宜. 2006. 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 [J]. 高等教育研究 (10).
- 文东茅. 2006. 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
- 吴愈晓. 2010.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 (1978-1996) [J]. 社会学研究 (2).
- 杨东平. 2006. 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重建农村教育过程中教师培养的研究^①

Research on Teachers Training in Reconstructing Rural Education

吴国珍 (Wu Guozhen)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目前农村学校人才断层危机，学生弃乡入城求学，大班额冲击正常教育环境，农村师源质量下降，年轻人不愿入职边远农村任教，这些问题，都是反逼农村教育重建的力量。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期国家财政对农村教师援助不力的背景，综合借鉴相关理论，检视相关教育政策，理解国际开放培养教师的理念和我国农村教师培养传统中相一致的精髓，尊重教育和教师培养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基础性本质，透视农村教师培养和农村学校需求之间从目前失衡到再形成新平衡的支点。认为在政府、专业、市场三者的博弈中，政策调控需要完善制度呵护教师心灵，为农村教师专业持续成长

① 本报告受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2011 年 12 月“构建当代教师教育体系”项目的启动，在 2012 年 4 月 23 日提交的研究报告基础上修改形成，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2011 年度承担的“985”项目“我国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状况调查研究：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的成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靳希斌教授仔细阅读初稿并给予鼓励和指导。在云南调研过程中得到思茅四小马蓉校长、云南财经大学教师陈孟云女士的热心帮助，在此深表感谢。